

本报记者探访河南受灾群众安置点——

“食宿有保障，就是很想家”

本报记者 余嘉熙 王伟伟
 本报通讯员 董君亚

7月28日，国新办就防汛救灾工作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7月16日以来，河南省洪涝灾害已造成郑州、新乡等16个市、150个县市区、1366.43万人受灾。累计紧急转移安置147.08万人。

紧急转移安置的147.08万人，目前状况如何？本报记者探访了几个临时安置点。

7月28日11时，记者来到河南省巩义市小关镇水道口村，随处可见树木连根拔起，道路损毁，房屋成片倒塌。

“我们是巩义受灾最严重的村之一。”临时安置点设在村部，谈起受灾情况，水道口村党总支书记张志伟直言自己“很受打击”。

“美丽乡村这一块，我们在乡村道路建设上可是全省第二名，村里美得很，很多郑州市民来我们这里旅游。”张志伟说，“现在简直不忍心看，原有的旅游道路，村道，便道，乡道，县道……被毁面积9成以上。”

“但是，只要人在，就有希望。大家没有丧失信心！”张志伟说，村两委提前做了预防，营救转移也及时，截至目前没有1例失联和伤亡事件。村委现在成了临时安置点，“住在这个安置点的有60多人，来这里吃饭的大约有400人。”

临近中午，村民们拿着搪瓷碗开始排队打饭。“面条味道可中，大锅饭就是香。”7月21日雨停之后，村里的大部分村民都在这里解决一日三餐。

52岁的郑向东很快吃完了一碗面条，然后把餐具洗干净。为了不给安置点增加负担，她和丈夫曹中现已在自家的车上休息了5个晚上了，只是在安置点吃饭。“我们有车，要把铺位留给更需要的人。”郑向东说，面包、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纸、应急药品……几乎所有生活用品，村里都是免费提供。

“目前救援物资比较充足，安置点内，医疗、住宿、餐食都有保障。大伙儿正想着灾后重建。”张志伟说，村委分为保通组、保障组、

安抚组、捐赠组4个小组，对村内事项一一整理登记。在这个乡村安置点，村民有什么生活上的需求，可以随时提出来，由工作人员解决。每天有郑州市、巩义市派来的工作人员轮岗保障，村里的医护人员在安置点24小时待命。还有一些志愿者为安置群众提供便民服务。

新乡市中北部的牧野区，也是此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由于暴雨和河流泄洪，城内水位居高不下，转移成为牧野区居民唯一的选择。

牧野区内的多所学校成了安置点。陵园小学作为牧野区面积最大的小学，大约有三四个被淹村落的受灾村民被转移到了这里。

“目前安置了大约1000名受灾群众。为了更好地提供服务，我们开展了‘班级责任制’的‘网格化’管理模式。”陵园小学校长李公家介绍，学校将校务人员分设6个事务小组，把每个教室作为一个“班级”，每个老师负责一个“班级”，从受灾群众中选出一个“班长”帮助“班主任”管理服务受灾群众。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网格化”的管理下，安置点的生活井然有序。

校园里，救援物资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处，吃饭的地方在另一处，“医疗救助点”里摆满了附近医院、诊所免费提供的应急药品，巡诊医生24小时守候。操场上有一块空地专门用来存放附近居民捐来的衣物，供紧急撤离到这里的受灾群众随挑随用。

受灾群众居住的教学室，干净整洁。大家将桌椅拼接起来当成床板，发放给每个人的被褥和洗漱用品都在桌子上整齐码放着。每间教室大约住着4~5户受灾群众，秩序井然。

在学校里，孩子们可以看见穿着红马甲、面容稚嫩的小志愿者。“我们都是这个小学的学生，特意赶过来帮忙。”小志愿者马晓雯告诉记者。

记者走访多处安置点发现，救灾物资都很充足，受灾群众的食宿得到了充分保障。

不过，对于在安置点内的群众来说，生活虽然有保障，最牵挂的还是自己的家。“我们



7月28日午饭时间，河南省巩义市小关镇水道口村的安置点，村民们正排队打饭。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啥时候能回家啊？”在鹤壁市淇县，随着汛情逐步缓解，安置点的受灾群众常常会向县疾控中心的葛拥军这样询问。

“啥时候能回家说不准，当前最重要的就是保障安置点群众的安全。”葛拥军说，安置点人员集中度高、流动性强，是灾后防疫工作的重点。

葛拥军介绍说，在淇县，所有安置点启用前都会进行全面消杀，此后每天两次定时消杀，安排专人对走廊、居住区等区域具体负责，确保转移群众不出现集聚性疫病。

“消杀工作主要是为了消除细菌和各类蚊蝇，切断传染源。”淇县卫健委副主任王海林表示，对于村民尚未回迁的村庄，待水位下降后，按照《淇县洪涝灾区预防性消毒方案》严格落实消杀作业内容，确保乡亲们安

全回家。

由于防疫任务繁重，自全面开展消杀工作以来，葛拥军等10多位在安置点从事消杀工作的一线人员，平均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酷热的天气使长时间穿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身上都起了痱子。

夜深了，安置点内的群众沉沉睡去。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大水尽快退去，生活恢复往日平静。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工，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老板当即表态：“马上筹建工会，月底前挂牌。”

在三星半导体(西安)公司，工作组发现该公司虽然成立工会多年，具体工作开展得也可以，但名称却是“泽兴会”。该会负责人说，这是因为员工不习惯叫工会。“这可不行。”经过工作组说明，该会负责人表示，马上改为规范的工会组织名称，并按要求重新设置工会机构。

按照全总“提出一批建议”的要求，工作组深入调研西安高新区鹿光街道、东大街道、灵沼街道、草堂科技产业基地、西安高新区软件园、综合保税区等19个街道和园区工会，实地走访几十家企业，深入了解基层工会组建及工作情况，探讨工会在企业治理结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了解先进制造业产业工人需求和工会工作开展情况，开展工会政策宣讲。

走访中，工作组及时提出一批有针对性的建议。同时，开展激发产业工人创新创造活力专题调研。“我们与各级工会干部、各类企业负责人、人力和科技部门负责人、劳模工匠、普通职工广泛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并依托微信小程序，向职工发放《关于激发产业工人创新创造活力问题调查问卷》，目前已有效填写1880人。”姜文良告诉记者。

(上接第1版)

为货车司机建“家”

筹建西安首个“货车司机之家”，是工作组重点工作项目中的重中之重。工作组认为：“这是一个切入点，可以带动以货车司机为代表的新型业态群体的工会组织覆盖和权益维护。”

在高速路服务区、物流货场等地，工作组利用各种机会找货车司机聊天。

“你是一个人还是合伙跑？经常从哪儿到哪儿？”“长途跑几天？晚上在服务区休息还是换人开着跑？”“吃住都在车上吗？路上最需要的服务、帮助是什么？”“有什么大家都想解决的共性问题？”“有没有劳动合同、工伤保险？”……一个个问题，拉近了工作组和货车司机的距离。

一次，在西安市区的一个货物装卸集散场，听说有全总的干部来听货车司机“吐槽”，7名司机一下围过来，你一言我一语把平时遇到的困难“倒”了出来。

“如果不深入一线与他们面对面聊天、拉家常，就不可能知道他们的真实状况；了解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帮他们解决，为他们服务，才能走上建立工会、维护权益的根本之道。”组员们说。

工作组一边收集全总、陕西省总、西安市

总关于货车司机的相关规定，函商西安市交通局核实有关数据；一边研究设计《西安市货车司机从业情况调研问卷》，依托微信小程序组织货车司机进行随机问卷调查。同时，多次访谈了解西安市物流行业工会联合会组建过程、工作开展及货车司机有关情况。到6月上旬，有590人有效填写了问卷，“一对一”拉家常访谈货车司机20人。

在充分掌握货车司机生存状况、认真倾听货车司机心声的基础上，工作组起草了《关于西安货车司机的调研报告》，梳理货车司机群体基本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并明确下一步项目设想。

调研报告提出了会、站、家建设一体推进的思路，筹建西安首个“货车司机之家”。根据货车司机的工作生活特点，集成提供多个服务项目，带动工会组织在货车司机行业的有效覆盖，并以点带面推动“货车司机之家”标准化建设。调研报告还建议，以工伤保险政策为切入点，协助陕西省深入研究全省货车司机行业发展现状，推动分类解决货车司机权益维护。

调研报告和建议得到了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黄宝妹：把劳模精神传递给年轻一代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七一勋章”获得者

本报记者 钱培坚

黄宝妹，从童工到新中国第一代劳模、再到“七一勋章”获得者，她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这位90岁的纺织女工从未停止为社会做贡献，她上短视频平台直播讲课，把劳模精神传递给年轻一代。

“七一勋章”颁授词写道：她是新中国纺织工人的优秀代表，为实现全国人民穿好衣的梦想，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坚持发光发热，是退而不休的老劳模。

在车间里工作了42年

黄宝妹，1931出生于上海，童年过得非常艰辛。1944年，13岁的黄宝妹进入日资裕丰纱厂当童工。每天早晨4点钟就要起床，在纺纱机前照看纱线，腰酸腿疼，手指也常被纱勒出血。童年的遭遇，让她对新中国有更深沉的感情。

上海解放后，黄宝妹把满腔热情投入到积极的生产劳动中。她立足岗位，勤动脑筋、苦心钻研，改进技术，探索出

一套“单线巡回、双面照顾、不走回头路”的先进操作法，使看台能力从400个纱锭扩大到800个，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1952年11月，21岁的黄宝妹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53年起，新中国正式拉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序幕。这一年，22岁的黄宝妹一人照看800个纱锭，创下全厂纪录（一般工人大约是600个）。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劳模，8次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回到上海以后，黄宝妹虚心向行业技术标兵学习，带领工人姐妹一起进步，她管理的三纺细纱车间被评为上海市劳模集体，所在的国棉十七厂向新中国贡献了大量优质棉布。

谢晋执导的电影《黄宝妹》，主演正是黄宝妹本人。她也因此成为那个年代的明星偶像，但黄宝妹拒绝走专业演员道路，满怀激情地回到纺织车间。

26岁那年，组织任命黄宝妹当干部，才可几天下来，她便感觉“浑身不舒服”，郑重提出要求回车间。她说：“我是一名普通的女工，纺织业才是我大有作为的行当。”

就这样，黄宝妹一直在车间工作了42年，直到1987年1月光荣退休。她曾先后7次被评为上海市、纺织工业部和全国劳动模范，3次出席国际会议。

退而不休 接续奋斗

退休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慕名邀请黄宝妹到石河子市协助筹建棉纺厂。黄宝妹多次来到新疆，从厂房设计到设备购买、从人员挑选到技术培训，兢兢业业，亲力亲为。有人问：“你既 not 占股又不领工资，为啥要那么辛苦？退休了享享清福吧。”黄宝妹却说：“党员是不退休的，只有不断奋斗，国家才能更加繁荣富强。”

1994年，黄宝妹看到一些退休劳模经济情况不好，家庭负担重，于是在上海市劳模协会的帮助下，牵头20多位离退休劳模集资成立上海英豪科技实业公司，并亲自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公司成立之初就约定，企业不分红，把利润拿出来帮助有困难的老劳模。大家都亲切地称该公司为“劳模公司”。

2006年回归社区后，黄宝妹发现很多居民工作忙、怕麻烦，导致小区业委会历经3年还建不起来。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挨家挨户做工作。“小区也是家，居委干部只有几个人，不靠大家怎么行？”就像年轻时说服工厂姐妹一样，“黄妈妈”用“绣花”功夫说服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家园建设，小区业委会终于成立了。

之后，黄宝妹还积极配合业委会工作，安装监控探头、灭蚊灯，更换破旧信报箱，拓宽应急通道……小区环境更优美了、邻里关系

更和谐了。

向年轻人传递劳模精神

黄宝妹直言自己年纪大了，精力不如以前。“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就要一直为社会做贡献。党员、劳模是一辈子的事情，我想给年轻人去传递我们的劳模精神，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工作非常重要。”黄宝妹说。

上海市“百老德育讲师团”成立后，黄宝妹积极加入，她和讲师团其他成员一起，秉持“要使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的理念，开展对孩子们的教育。讲师团20余年来为数百万人次的青少年义务举行德育讲座万余场。

“她是最生动、最可信的教材。”听过黄宝妹讲座的人都说，“在她身上，爱国主义是可触摸、可感悟的。”

2016年，杨浦区“金色夕阳”老干部正能量工作室成立，黄宝妹第一时间报名加入。但如何让更多的青年人静下心来倾听并从中获益？如何让更广大的年轻人体会到老一辈眼中视若珍宝的品质？

黄宝妹为之动足脑筋。她紧跟时代潮流，在哔哩哔哩短视频平台“老杨树宣讲汇”直播间当起“网红主播”，向校区、园区、社区的“后浪”们讲述身边的党史，带领大家一起回顾国家发展，加深对“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蓝图的理解和领悟。

全国已有315个统筹地区 开通门诊费用跨省结算

本报讯（记者李丹青）记者近日从国家医疗保障局获悉，目前29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有315个统筹地区开通了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覆盖了全国70%的统筹地区。其中，北京、天津、河北等18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实现区域内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是医保便民惠民的重要举措。今年4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明确，2021年底前，将基本实现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统筹地区全覆盖；2022年底前，每个县至少有1家定点医疗机构能够提供包括门诊费用在内的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国家医保局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负责人蒋成嘉介绍，全国普通门诊费用跨省联网医疗机构已有2.37万家，覆盖了全国近50%的县区；联网药店也达到了4.26万家。今年上半年，全国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约339万人次，涉及医疗费用8.48亿元，基金支付4.65亿元，已超过去年全年的结算规模。

“客观上讲，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工作的推进难度要比住院大。”蒋成嘉指出，试运行期间的数据显示，全国医保门诊结算频次大概是住院的17倍，目前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日均人次超过2.5万，约是住院结算人次的2倍。相比住院，门诊费用结算对时效性要求更高。

蒋成嘉坦言，各地医保门诊报销政策地区间有差异，跨省直接结算要平衡各地保障范围、方式和水平，这对结算规则和结算服务提出了较高要求。

“目前，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建设正在推进中，以往各地医保和医院信息系统建设标准不统一，需要逐一改造接口。如果参保人没有进行备案、中断缴费、社保卡没有激活、所在市县和医药机构没有开通门诊直接结算，都会导致结算失败。”蒋成嘉说，门诊跨省直接结算对全国医保信息系统的支撑能力、运行稳定性和经办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全力攻关解决这些难点、堵点，逐步解决各地医疗保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加快医保信息化、标准化建设，让更多的参保人享受到跨省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的便捷。

(上接第1版)

一段时间以来，部分移动应用程序(APP)通过一揽子授权、与其他授权捆绑、不点击同意就不提供服务等方式强制索取非必要个人信息的问题比较突出。对此，最高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陈龙业介绍，《规定》引入单独同意规则，即信息处理者在征得个人同意时，必须就人脸信息处理活动单独取得个人的同意，不能通过一揽子告知同意等方式征得个人同意。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强迫同意无效规则。对于信息处理者采取“与其他授权捆绑”“不点击同意就不提供服务”等方式强迫或者变相强迫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的，信息处理者据此认为其已征得相应同意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不仅适用于线上应用，对于需要告知同意的线下场景也同样适用。

小康路上法援护航

(上接第1版)

为王某忠提供法律援助的是“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刘晓慧律师。“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每年组织一批律师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到中西部无律师县和律师资源短缺的贫困县，为当地的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被告听到要赔60多万元时是绝望的。”刘晓慧认为，案件起源于易地扶贫搬迁，涉及政府监督、房主、包工头多个主体，并不是简单的工伤赔偿案件。在刘晓慧的努力下，死者刘某清家人得到了应有的赔偿，被告王某忠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也保住了扶贫安置的新房，原被告两个贫困户都表示满意。

一案多赢

2019年10月，青海省甘德县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因原公司股东不配合，为企业改制和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困扰。作为甘德县政府法律顾问，律师胡良瑞前往处置。

“我提出了破产重整或带权转让的处置方案，并且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及时帮对方拟定相关文件，提出相关的建议，最终达成了股权全资收购的协议。”胡良瑞说。最后，他提出的工作建议被甘德县政府充分采纳，保障生产促进发展的脱贫思路得到了进一步实践。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当年3月19日，有劳动者来到广州市白云区法援服务大厅，反映某公司在疫情期间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请求白云区法援处帮助他们讨薪维权，此案牵涉的劳动者共19名。

法援律师赵鑫接受指派后，了解到2020年2月中旬，劳务派遣单位以实际用工单位经营困难为由，未经过法定程序直接解雇19名劳动者并停发他们2月份的工资。同时，这19名劳动者还与某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鉴于疫情特殊时期，赵鑫采取电话沟通、组建微信群的方式向每一位劳动者收集证据材料，到法院立案。最后，劳动者与企业就拖欠工资和经济补偿金的调解方案达成一致。

在这起纠纷中，法援律师的介入促成调解结案。19名劳动者复工，3家企业复产，实现了一案多赢。

播撒种子

今年5月起，司法部在全国开展为期两年的“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活动，保障困难群众获得优质法律援助，突出包括农民工、特殊群体、易返贫致贫户在内的三类服务对象，推动将涉及农民工和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切身利益的劳动争议、土地纠纷、养殖种植、环境污染等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

依托中国法律服务网“农民工欠薪求助绿色通道”等平台，2018年至2020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帮助152万名农民工追回薪资1500多亿元。

记者还了解到，“十三五”期间，“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向中西部地区15个省（区、市）400多个县（区）派出法律援助志愿者1200多人次，办理案件2.8万余件，化解群体性矛盾纠纷1.8万多次，为困难群众挽回经济损失或取得合法权益利益19亿余元，700万余人直接受益。

在思想观念上培育法治土壤，消除法治贫瘠，成为法律援助律师的共识。已连续3年在云南偏远县市区开展法律援助服务的冯娟娇律师，发现当地少数民族妇女的法律知识匮乏，很多人不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发现这一情况后，我联系了当地妇联共同开展妇女普法教育。”冯娟娇说，“多播撒一粒法治的种子，思想上就多收获一份法治的富有。”